



屈原是怎样从人变成了神

从狂狷之徒到爱国志士

□九雨衣

又到一年端午时。每到这个节日,人们除了吃粽子,饮雄黄酒之外,还会悼念屈原。今天的屈原,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诗人,而是作为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为后人所敬仰。在很多人心目中,汨罗江的那一跳,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的最为动人的爱国乐章。

但是,在历史漫长长河中,屈原最初的光芒并不像今天这般耀眼、灿烂。最初,他只是人们眼中的狂狷之士,一个不为世俗羁绊的文人,后来经过宋明两朝的“改造”,他才成为了如今爱国主义的典范。

汉代:屈原拥有两张面孔

屈原,本名叫做“平”。按照《史记》的记载,他是楚武王的后代,在年轻时便得到了楚怀王信任,任左徒、三闾大夫,兼管内政外交大事。任职期间,屈原力倡“美政”,主张对内举贤任能,修明法度,对外力主联齐抗秦。因遭子兰等人排挤诽谤,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。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,自沉于汨罗江,以身殉楚。

不过,在屈原死后的几十年间,人们对他并不在意,甚至对其文学成就也没有多少评价。这也很好理解,毕竟,灭亡楚国的是秦国,老百姓谁也没有胆子,在秦朝统治时期,公开怀念这位终身反秦的楚人。

直到西汉王朝建立,屈原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。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楚地,自然而然,楚

国文化便成为了西汉王朝的主流文化。而屈原和他所创的“楚辞”也因此成为文人学者竞相研究的对象。

其中最著名者,叫贾谊。在汉文帝时,贾谊被贬官到长沙,任长沙王太傅。途经屈原放逐之地,想到了自己的遭遇。在滚滚的湘江边,贾谊将满腔的愤懑诉诸笔端,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佳作《吊屈原赋》。

在这篇文章中,贾谊对屈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,并对屈原“忠贞”的精神大加赞赏。但是,他对屈原最终以身殉国的做法并不赞同。他认为,在楚亡之后,屈原不应该为那些昏君佞臣殉葬,他应该就此隐世,“远浊世而自藏”,这才合乎“圣人之神德”。

这一观点,被后世的司马迁所继承。太史公或许是在屈原身

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因而对屈原推崇备至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第一次为世人还原了屈原的形象——一个志向高洁的人,一个悲天悯民的人,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。

不过,随着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对于屈原的评价趋于多元化。负面的批评开始占据上风。这其中批判最为激烈的是东汉的史学家班固。他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,而不是露才扬己,指责屈原作赋“责数怀王,怨恶椒兰”的做法,违背了臣子的礼数,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,乃是彰君之恶,不符合忠君爱国的做法,因此不值得人们效法。

班固的这个观点,在当时很有影响力。此后,屈原究竟是“忠贞之士”还是“狂狷之徒”,引发了学界激烈争议。

宋代:屈原逐步走向了神坛

关于屈原的争议,到汉安帝时期才得以平息。

汉安帝时,出了一个文学家,他姓王名逸,字叔师,湖北襄阳人。王逸一生最出名的事情,就是为《楚辞》做注,他所著的《楚辞章句》使他成为当时屈原研究界的权威。

在王逸眼中,屈原是那种颠能扶国、危能安邦、“进不隐其谋,退不顾其命”的志士,这种人虽然有狂狷举动,但瑕不掩瑜,仍是要把他当做“忠贞之士”来看待。鉴于王逸的地位,在他做出这一番评价后,关于屈原形象的争论,渐渐平息。

此外,王逸还将屈原思想纳入了儒家的范畴,这一观点为宋朝对屈原的“改造”提供了理论支持。

如果说汉朝时的屈原形象,还带有一丝狂士之气,那宋朝时的屈原,就已

经彻底成为了儒家口中的圣贤。

宋朝对屈原的“改造”是从晁补之开始的。

晁补之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,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。他认为孔孟之后、荀子之前,是儒家伦理堕落的时期。那个时候,无论是《诗经》,还是《春秋》,都被人们所抛弃。而在无际的黑暗之中,只有屈原仍在楚国秉持着君国大义,恪守着人臣本分。自此,屈原成了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。

此后,宋代著名学者洪兴祖又将屈原的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。在《楚辞补注·离骚后序》中,他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。他说:“忠臣之用心,自尽其爱君之诚耳。死生毁誉,所不顾也。故比干以谏见戮,屈原以放自沉。比干,纣诸父也。屈原,楚同姓也。为人臣者,三谏不从则去之。同姓无可去之义,有死

而已。”洪兴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,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,将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,认为楚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听屈原的话。屈原就此开始“圣人”化。

到了南宋时期,屈原正式步入了神坛。朱熹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人格精神方面,他认为屈原至死不渝,执着追求,最终投江而死的做法虽然有违儒家的中庸之道,但是屈原为国家慨然赴死的出发点,是值得肯定的。朱熹极力反对汉儒对屈原狂狷的指责,他指出如果非得找出屈原有缺点的话,那只能说“过于忠”,而这也“合乎圣贤之矩度”。朱熹将屈原进一步伦理化、儒家化,最终扭转了对屈原的评价,将他彻底改造成了儒家的圣贤。

从宋朝开始,人民心目中的屈原,已经没有了狂狷的气息,而成为了一个忠贞的“圣人”。

明清以后:屈原成为爱国主义象征

明末清初,中华大地再次迎来了巨变。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朝,在农民军与清政权的联合夹击下,走向了灭亡。而满族,这个在马背上兴起的民族,却在吴三桂的带领下,准备君临这片富饶的土地。这在历来自认为处在世界中央,强调华夷之辩的汉族学者心中,是一个既难以接受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。

清朝入关之前,打的旗号是为明朝复仇,但是满族贵族们在中原站稳脚跟之后,便撕碎了此前所戴的“面具”。剃发令、圈地等政策开始在全国推行。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迅速激化,一些不堪忍受的

汉族人开始反抗清王朝的统治。不过一波接一波的反清浪潮,虽然声势很大,但是并没有形成合力,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武力反抗的失败,让一些学者不得不把满腔的愤恨诉诸案头,从文化上对清政府进行攻击。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,这些学者从屈原时代的朝廷纷争中,看到了晚明党争的影子,从屈原力主抗秦的呼声中,听到了抵御异族、保家卫国的战斗号角。于是,屈原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,他不仅仅是儒家口中的圣贤,优秀的道德模范,更是反抗异族的斗士,夙志抗敌的英雄。

至于那些在明末清初亲身参加抗清斗争至死不屈为民族献身的英雄,更是将屈原和其诗作为精神支柱,史可法曾手书陆游纪念屈原之诗以抒怀,少年英雄夏完淳在《大哀赋》里表示了追随屈原的决心。而不甘亡国的艺术家也以其它艺术形式表现屈原,如与史可法同时的画家陈洪绶、肖从云,就画了“离骚”“九歌图”“屈子行吟图”以抒忧愤之情。

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帝国主

义的入侵,使中国一步步殖民化。到了清末,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,清政府进一步和殖民主义者勾结起来,把中华民族推进了痛苦的深渊,此时,不论是改良派,还是革命派,只要是立志救国救民的有识之士,都对屈原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。
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屈原的精神更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柱。众多的抗日英雄对屈原进行了赞颂,郭沫若的历史剧《屈原》空前巨大的影响,闻一多、郭沫若等一大批学者的屈原研究,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。

到了现代,对于屈原研究的角度更加多元化。这固然是好事,但需要注意的是,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,如“屈原是同性恋”“屈原只是文学弄臣”开始在网上流行。笔者无意考证这些观点的真实性,但大家要明白,即便屈原私德上可能有不妥之处,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仍值得我们学习。面对国破家亡时,我们自己的生命应该干什么。希望大家不要舍本逐末,忽视了屈原精神的内核。

